

Essentials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中国近代经济史概论

杜恂诚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经济史概论

杜恂诚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经济史概论/杜恂诚主编.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11
ISBN 978-7-5642-1179-0/F · 1179

I. ①中… II. ①杜… III. ①中国经济史-近代-研究生-教材 IV. ①F1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1067 号

☐ 责任编辑 宋澄宇

☐ 封面设计 张克瑶

☐ 责任校对 王从远

ZHONGGUO JINDAI JINGJISHI GAILUN

中国近代经济史概论

杜恂诚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印刷装订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22.5 印张 590 千字

印数:0 001—3 000 定价:46.00 元

前 言

这是一本为经济学研究生编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材,也可以供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作学习参考之用。现在很多研究生,包括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过去从未上过经济史的课,也几乎很少读过经济史方面的著作,所以本教材虽然是以专题形式呈现的,但还是尽可能地把重要的知识点纳入其中。

经济史学需要创新,需要把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其他学科,比如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等,运用于经济史的研究之中。但这是一个过程,需要一个一个专题的积累,一步一步的探索,不应该指望有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只可能从现实出发,从现实的研究基础和研究状况,以及现实的研究人员的兴趣和知识结构出发,逐步积累和转型。这个目标是不会一蹴而就的。另一方面,经济史的创新还在于历史资料的发掘和创新,也就是对某一个领域的第一手史料的发掘。理论和方法的创新要与史料创新结合起来,取得两方面的平衡。所以经济史学需要双重创新。但是,本书作为教材,并不强调第一手史料的发掘。教材更应注重介绍别人所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并在引用时遵守学术规范。

现在已有好几所大学编写出版了经济史课程教材,有给本科生的,也有给研究生的,内容、体例不尽相同。我想,这应该是一件好事。我们不必去追求雷同的东西,对历史的理解各有差异,才能体现出各校学科特点来。

本书作者的分工如下:

杜恂诚 全书设计及统稿,并撰写第一、九、十一、十四章;

孙 林 第四、五章;

李耀华 第二、三章;

魏 忠 第六、七章;

江金彦 第八章;

曾 凡 第十章;

台金辉 第十二章;

李 晋 第十三章;

王 颖 第十五章;

高 峰 第十六章；

徐 琳 第十七章；

柯 华 第十八章。

每章后面附有推荐阅读书目和思考题。

本教材得以出版,还要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及其责任编辑宋澄宇先生。本教材还列入了上海财经大学“211”三期教材编写计划,得到三期的教材项目资助。

杜恂诚

2010年7月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编写宗旨	1
第二节 经济史研究方法介绍	2
第三节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若干研究模式	6
第四节 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史的几个理论问题	7
第五节 鸦片战争失败后签订的中外不平等条约的主要内容	9
第六节 学习中需要关注的若干问题	10
第二章 鸦片战争后新式商业的产生	13
第一节 传统商业的存在和新式商业的产生	13
第二节 分工与新式商业	21
第三节 新式商业中的买办制度	28
第三章 洋务运动——与日本幕藩改革比较	32
第一节 历史比较分析	33
第二节 洋务运动	34
第三节 洋务运动与幕藩改革的比较	40
第四节 洋务运动对近代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46
第四章 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国经济	49
第一节 清末新政时期的经济改革	49
第二节 清末新政时期的经济发展	52
第三节 新式工矿业的发展	56
第四节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61
第五节 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64

第五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经济	70
第一节 北洋政府的经济政策	70
第二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发展	74
第三节 新式工矿业的发展	77
第四节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83
第五节 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87
第六章 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的中国经济	91
第一节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91
第二节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105
第三节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113
第七章 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的中国经济	121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国统区经济	121
第二节 上海孤岛经济的畸形发展	134
第三节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经济	137
第八章 近代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142
第一节 近代股票市场的发展	142
第二节 近代的房地产市场	155
第九章 中国近代金融制度	167
第一节 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	167
第二节 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	170
第三节 制度推进的速度、力度和可操作性	172
第四节 制度产生的约束条件	174
第五节 金融与经济的关系	176
第十章 近代中国外贸和外资	179
第一节 近代中国对外贸易	179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投资	189
第十一章 儒家伦理与中国资本主义和企业制度	201
第一节 马克斯·韦伯关于儒教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论	201
第二节 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经济发展的关系	205
第三节 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企业制度	210
第十二章 近代中国财政	218
第一节 晚清财政	218

第二节	北洋政府的财政·····	221
第三节	国民政府的财政·····	225
第十三章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1840~1937)·····	230
第一节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	230
第二节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业部门的结构和增长·····	237
第三节	近代中国的市场结构和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的发展·····	241
第四节	资本主义发展和国民经济结构·····	244
第十四章	“官僚资本”与近代中国的社会阶层序列·····	249
第一节	对近代中国“官僚资本”和社会阶层的理解·····	249
第二节	近代中国城市阶层排序和收入分配测算·····	256
第十五章	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	264
第一节	区域经济·····	264
第二节	城市经济·····	267
第三节	城市化·····	275
第十六章	农村经济·····	280
第一节	土地制度·····	280
第二节	农业生产力·····	289
第三节	农村经济结构·····	296
第十七章	近代市场特征与发育程度·····	303
第一节	从传统到现代:开放与扩大的近代市场·····	303
第二节	近代市场的分割性·····	307
第三节	近代市场发育程度·····	315
第十八章	影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诸因素分析·····	322
第一节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	322
第二节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诸因素分析·····	327
第三节	政府与中国近代经济增长·····	346

第一节 编写宗旨

一、编写目的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本科教材,现在已经有好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版本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编一本?回答是:这是为了反映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史教学的特点。

经济史是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经济史并没有固定的方法,也不像那些以演绎为主的课程那样,有固定的课程逻辑框架。也就是说,经济史教材的内容有很大的可选择性。由于教师的知识积累和偏好的不同,教材的内容就可能很不相同。

从已有的经济史教材来看,有的是以历史的时间顺序来编写的,有的则完全是按照专题来编写的。这两种写作方法都可能会遗漏掉一些重要的内容。本教材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第二至第六章是按时间顺序来安排的,以下各章则是按专题来安排。根据我们的教学经验,这样的体例安排可以把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内容较大限度地、相对比较完整地表述出来。这是本教材的特色之一。

经济史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许多经济史书籍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史料,让初学者感到晕头转向,看过以后也不可能记住这么多的数字和资料。我们主张:本书的编写尽量避免繁琐考证,力求做到简明扼要。但在理论阐述、规律分析方面,则尽可能给予读者大的信息量和知识量。这是本教材的特色之二。

为了提升读者对经济史的兴趣,我们参考曼昆编写《经济学原理》和马克·斯考森编写《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的经验,尽可能地把我们这本教材编得生动活泼,可读性强。这是本教材的特色之三。

二、课程所要达到的目标

- (1)初步掌握相关的历史知识;
- (2)了解一些研究方法;
- (3)培养一定的历史观。

对于第(3)项,我们要注意防止历史决定论和历史虚无主义两种倾向。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因此历史决定论是不可取的,对于这个问题也是相对比较容易认识的;但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是有路径依赖规律的,有些规律可能产生长期时期的影响,那么有无历史观就大不相同了。因此,我们青年学生特别要注意防止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有些青年人比较轻视历史,认为学习历史没什么用。这是短视和功利的价值判断在青年人身上的一种反映。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人会渐渐喜欢历史的。

三、本课程学习要求

1. 反对标准答案式的教与学

许多同学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养成了把书本和老师说的当成这门课程的全部内容,老师给大家出标准答案,学生死记硬背,在考试中争取拿高分。这种僵化的、不科学的学习方法,是升学至上的考试制度造成的。

历史学就像许多社会科学一样,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就像人们对于现实生活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见解一样,人们对于历史的见解可能会有更多的不同。人们会在这种多样化的思维中受到启迪。人们的创新思维也在这种多样化的思维中得到实现。这正是我们最寄希望于青年人的地方,我们怎么还能以陈腐的教学和考试办法去压抑它、扼杀它呢?

对于上文中所列出的本课程所要达到的三个方面的目标来看,标准答案式的教学和考试至多只能有助于学生掌握一些历史知识,却会压抑学生的创新思维。所以,本课程不采取这样的教学和考试方法。

2. 要求启发心智,讨论互动

我们要求学生除了掌握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外,特别要锻炼和培养自己创新思维的能力,在对经济史的探索中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并通过课堂上及课下的发言或讨论互相启发心智。

根据我们的安排,本课程的期中和期末成绩都不是通过闭卷考试产生,期中每位同学可有一至二次事先做过书面准备的课堂发言,可选择课程提纲中自己感兴趣的题目,事先收集一些资料,就某一点发表自己的看法;期末则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写一篇稍大的心得文章。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样安排的效果要远远胜过问答题式的考试。

第二节 经济史研究方法介绍^①

以历史事实的归纳作为研究基础的经济史学,作为交叉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可以是多样化的,依问题、资料、条件、视角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也可能因研究者的偏好或知识结构的不同而各不相同,所以有“史无定法”之说。每一种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历史学理论都有可能成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以下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

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是一种主要的历史学方法,注重收集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包括

^① 关于本节经济史研究方法的介绍,除另外注明外,主要参考并引用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相关章节的内容以及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6),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的内容。

档案资料、报刊资料、文契、租约、账册等。这种方法也可以称为实证主义方法。这种历史学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因为经济史研究不可能做不切实际的纯公式推导,而是建立在对事实归纳的基础之上,因此,大量收集资料是经济史研究的前提。

根据本书编者的研究心得,对研究资料的重视要防止两种倾向:

一种是盲目相信前人编的资料集,以为这就是有关资料的全部。这可能成为一种误导。前人编的资料书可以作为我们的重要参考,但前人由于当时的环境、他们的兴趣点或偏好以及理论出发点的不同,对于资料可能做过取舍,而在当时被舍弃的,在今天则可能就是我们所感兴趣的;另外,前人由于人力和精力方面的原因,整理的资料总是相对有限的。所以,我们还是提倡研究者直接从研究第一手资料开始做起。经济史的丰富多彩就隐藏在看起来杂乱无章、需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才能收集起来的资料之中。

第二种倾向是过多地注重细枝末节,脱离理论阐释而纠缠于繁琐考证。在知识和信息爆炸的时代,对我们来说,细枝末节的历史事实就显得不怎么重要了,除非它是跟一个理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二、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它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后者又对前者有反作用。这就是历史辩证法思想。在研究工作中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要承认社会各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对于各个领域的问题,可以分别进行研究,如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第二,各个领域是相互影响的,彼此的关系是辩证的,绝不是简单化的经济决定一切。

三、计量分析方法

计量分析方法可以更具体地分为统计学方法、计量经济学方法和计量史学方法。

1. 统计学方法

经济史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数字概念。在经济史研究中,或者我们阅读一本经济史的著作,如果只有定性分析,而没有定量分析,我们就会觉得不像是经济史的作品。在经济史定量分析中运用最多的是统计学的方法。

研究中国古代和近代经济史的时候,我们最感棘手的困难之一,是统计数字的缺乏。近代虽有一些国家行政部门要求的统计和一些地区的统计,但经常口径不一致,或只有个别年份的数字,而缺少时间序列数据。为此,我们有时需要作出有理论和史实依据的估计来加以弥补。这类统计可以是实数,也可以是指数。如梁方仲编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孔敏主编的《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等都是很好的统计作品。经济史学者在作文时常常引用统计,或对原有的统计作出修正。

2. 计量经济学方法

计量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最早是投入产出分析,继而有回归分析、相关分析,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博弈论等分支。计量经济学方法是建立一个或多个数学模型,找出参数或系数来确立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从模型中推导出指定变量的预测值,用以作出理论判断。模型使用的是过去的历史统计数据,可以用它来考察历史上经济变动的因果关系。

计量经济学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是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两种。

线形回归是用一直线来表达两组变量间的平均变化关系,其方程是:

$$Y=a+bx$$

式中, x 是自变量, Y 是因变量, b 是回归系数,即回归线的斜率, a 是常数。在经济史研究中,时间常为重要因素,上式即为时间方程, x 为时间(如年), b 则变为速率(如年率)。

美国学者赵冈从孔府档案中得出 1736~1775 年汶上县梅花庄麦、豆、高粱、杂粮的历年产量,用上式算出这期间亩产量的平均变化率 b 。

美国学者勃兰特(L. Brandt)在《华中及华东的商业化与农业发展》一书中所作 1870~1936 年上海米价和棉价的计量分析。上海米价受外国进口米价和汇率变动的影响,可列出二元回归方程:

$$\ln P_s = a + a_1 \ln P_m + a_2 \ln R + u$$

其中, P_s 为上海米价(海关两), P_m 为越南、缅甸、印度出口米价的平均价(英镑), R 为汇率(英镑/海关两)。 a_1 和 a_2 为系数,即上海米价变动中归因于 P_m 和归因于 R 的份额。求解结果如下(括号内为标准差):

$$a_1 = 1.105(0.045) \quad a_2 = -0.983(0.045)$$

$$R^2 = 0.928$$

由上可知,上海米价是受外国米价支配的,而汇率因素也很重要。棉价情况有所不同。勃兰特以 P_s 为 1900~1936 年的上海棉价, P_m 为同期美国棉价(代表国际棉价)。测算结果,汇率起最重要作用,美国棉价次之:

$$a_1 = 0.854(0.093) \quad a_2 = -1.179(0.137)$$

$$R^2 = 0.718$$

南开大学刘佛丁等用物价指数和进出口贸易指数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周期,作出了宝贵的探索。

3. 计量史学方法

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福格尔(R. Fogel)和恩格尔曼(S. Engerman)等。他们建立“反事实模式”的计量模型来研究美国经济史。福格尔在 1963 年出版《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认为过去人们将铁路的作用夸大了。他把铁路运输的经济效益用“社会储蓄”来表达,即它在国民收入中的贡献。计量研究的结果,认为假定美国不修铁路,而用马车等其他运输工具,结果并不差,国民生产总值相差不超过 3%。1974 年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合著的《十字架上时代: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出版,震惊学界。他们不讲奴隶制本身,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投资方式,用计量学方法来分析,奴隶种植园的收益率高于北方的家庭农业,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北方,且奴隶的寿命较长,劳动力也较强,剥削并不严重。该书出版后,引发争议。

一些西方学者对计量经济学方法和计量史学方法提出批评,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计量方法所用的系列数据(数十年至数百年)的内涵不同;二是非市场的制度因素在数量中看不出来。

四、发展经济学方法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学者在发展经济学中异军突起,提出了结构主义、依附论、不等价交换等理论。他们运用大量资料和计量经济学方法作对比分析,认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已形成一种世界性经济结构,后者依附于前者,处于前者的边陲或卫星国地位,经济剩余被中心国榨取去,即使按照李嘉图比较成本说,也是处于不等价交换地位。

五、区域论和周期论方法

区域论和周期论方法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派别,其代表人物是施坚雅(W. Skinner)和哈德威尔(R. Hartwell),并影响了日本、法国等国的中国史学者。这种方法又称为“空间时间研究法”,把中国分为八大经济区,清以后加上东北成九大区,每个区都有一两个核心区,经济发展是由核心区向边缘区推广的,大区内由各级市场和资本、劳动力的转移相联系,形成多级性体系。各大区的发展都有周期性。周期一般有四个阶段:边区(未开发)阶段、大发展阶段、衰落阶段和平衡阶段。如东南大区在唐开元前还处于边区状态,开元末到宋孝宗时大发展,此后处于平衡状态,南宋到元一度衰落,明洪武后又大发展。大发展时边缘区快于核心区,衰落时也是边缘区先衰落。两者的相关程度可用计量方法算出。

六、社会学方法

社会学方法的基本特点:第一,它认为每个民族或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其发展的道路是不同的。第二,它重视“底层”即大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作为方法引入经济史研究。第三,它重视社会调查,积累了一套科学的调查方法。在这方面,长期以来,马克斯·韦伯关于中西方宗教伦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流地位,而本书主编撰写的《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则是对韦伯学说的回应和批评。

韦伯认为:西方的新教徒把勤奋工作看成上帝授予的使命,他们对于现实世界取积极进取的态度,西方经济由此兴起;而中国儒教徒只会消极地去适应世界,因此中国资本主义不能产生^①。

本书主编认为:儒学不是“教”,简单地拿早期的儒学与西方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相比是不妥当的。鸦片战争后以儒学和西学的融合为特征的中国商人表现出非凡的进取精神,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七、系统论方法

系统论研究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两千年来内部的震荡只引起王朝的更替,结果是封建模式的复制,重归于稳定。也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封闭系统,不能容纳外来因素输入,因而停留在稳定状态。系统论研究者大多把中国传统社会分为三个子系统,即权力(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文化(思想)系统,可谓包罗万象。还要研究系统与外部环境(如地理、气候、邻国)的关系,上下两千年,研究的范围庞大无比。这样的研究容易流于粗疏。

八、新制度经济史学方法

新制度经济史学方法重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特别是产权制度。此外,对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演变的作用也有系统的理论阐述。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诺思(D. C. North)。他在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

^① 可见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有效率的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之所以能够成为有效率的组织,原因就是它“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受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①。

本书主编则在《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一书中对中外金融的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不同交替规律作了尝试性的总结。

西方新制度经济史学的最新发展是历史的制度分析方法的产生。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格雷夫教授(A. Greif)。他和同道者通过研究历史文献,发现在西欧中世纪晚期的商业革命中,商人行会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在与统治者的博弈过程中,为达成协议、强制履行协议以防止统治者违约作出了贡献,并因此而扩大了贸易。他们的历史制度分析方法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缺少国家和中央的法律体系条件下的“自我实施制度”上,填补了以往制度经济史研究的空白;他们创造性地把博弈论方法与历史经验归纳法相结合,在方法上独具特色。^②

本书编者发现:在近代中国清末以及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在金融法规的制定上,在金融监管方面,在采取措施防止金融波动方面所做甚少,当时的上海等地的钱业公会以习惯法作为“自我实施制度”,使金融市场得以相对健康地发展。^③ 银行公会的情况类似。

第三节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若干研究模式

可以说,每一种方法都是一种模式。在这里,编者只选择几种较有特色的模式予以介绍。当然,选择之中自然带有编者的主观成分。

一、费正清(J. K. Fairbank)的“冲击——回应”模式

费正清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权威,著述颇丰^④。他认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中国,中国作出回应,才有了近代经济的发展。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是主动的,中国是被动的,新的经济成分是从西方输入的,新的观念和法律也是从西方输入的。而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因此,19 世纪中叶西方的冲击是中国步入近代文明的前提。

二、柯文(P. A. Cohen)的“中国中心论”模式

所谓“中国中心论”,是针对所谓“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而言的,认为应以中国为研究的出发点,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其代表作有《在中国发现历史》等^⑤。近年来所谓美国加州学派的一批学者颇为活跃,他们的观点与柯文是一致的。他们甚至反对用“传统”和“近代”的概念来研究中国经济史。他们不认为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不利于经济进步的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彭慕兰(K. Pomeranz)认为 19 世纪中国和英国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只是在“地下和海外”,即煤矿储藏情况的不同和海外殖民地的

① 诺思和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韩毅:《历史的制度分析——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新进展》“绪论”,辽宁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杜恂诚:《近代中国钱业习惯法——以上海钱业为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④ 在这个问题上的代表作为: Teng and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⑤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有无^①。

三、刘易斯(W. A. Lewis)等学者的不发达国家二元经济模式

所谓二元经济,是指发展中国家同时兼有的先进的工业和落后的农业,或先进的城市经济和落后的乡村经济。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把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特征与所谓“无限过剩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问题联系起来,形成所谓的“二元结构发展模式”。这是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该模型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结构差异,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隐蔽失业或过剩劳动,存在着工业部门能以不变的低工资源源不断地得到劳动供给的可能。新古典主义对二元经济模型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后两个理论假定上。^② 中国经济史学者中也有反对用二元经济模型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但无可否认,二元经济模型有其合理的一面。它对我们认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四、黄宗智的中国农业“内卷化”模式

美国华裔学者黄宗智研究中国近代农业问题的代表作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他认为中国的农业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或者称之为“过密化”,就是“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他认为,过密化必须区别于现代经济发展,因为它不会把农村引向结构性质变。仅敷衍口水平的小农生产持续着,甚至随着商品化、农作密集化和家庭工业更为复杂。小农生产远未被节省劳动力的资本化生产所取代,而实际上通过推动向低成本劳动密集化和过密化的方向变化而阻碍了发展。^③

五、杜恂诚的中国近代经济的政治性周期模式

对于中国近代经济,许多人关注外因。其实在很多时候,内因是起主导作用的。所谓政治性周期,是指像近代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由政治因素所引起的经济制度、产权结构、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周期性变化。这一周期由四个阶段构成,即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官营经济发展和政府规模膨胀阶段、政府维持提高和财政困难阶段、扶持民营经济或失控阶段。然后经战争改朝换代以后,又以强制性变迁开始新一轮的周期。这种政治性周期与世界市场经济周期波及和本国经济因素三者交互作用,产生不同的效应。^④

第四节 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史的几个理论问题

尽管本书主要讲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问题,但对于近代之前的若干问题,也需要有所交代,以使读者对历史有连贯起来的看法,并对近代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一个铺垫的认识。与前述

^① [美]彭慕兰:《大分流》,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228页。

^② 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③ [美]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72~73页。

^④ 杜恂诚:《中国近代经济的政治性周期与逆向运作》,《史林》2001年第4期。

对模式的理解类似,对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史中问题的提取,也带有编者的主观成分在内,尤其是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更是编者的一家之言,读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尽可博览众家成果,择其善者而从之。

一、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有一部分市场经济作补充

中国传统社会中就有一定规模的市场经济,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在有些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不是定位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是一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①或者说,由于农业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有的地方的农民种粮食多一些,有的地方的农民织布多一些,种粮食多的农民就拿粮食同织布多的农民交换土布。其他情况也一样,这就形成了市场。其二是由于政府财政的赋税征收而产生的市场。从西汉以后,政府征税,有一部分是以货币的形式来征收的,特别是明一条鞭法以后,征税全部是征银,农民必须抛售农产品来换取货币,这就形成了财政性的市场。^②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市场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也不能简单地把市场作为资本主义新经济产生的充分条件。

二、不完整的私有产权及产权交易的低效率

中国的土地私有制度虽然很早就产生了,但是这种土地私有制度并不是“充分、独立、完整”的。政府作为土地产权的最高和最终的所有人,可以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干预或剥夺私人产权。中国历史上,政府常剥夺一部分人的土地,同时实行“均田”、“限田”等政策重新分配土地就是明证。^③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实行“永佃制”的地区,产权又有田底权和田面权的分解,或称田骨、田皮;田根、田脚。这就是所谓“一田二主”,田底业主拥有所有权(或如有的学者认为的拥有七成所有权),田面业主拥有使用权(或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除拥有使用权外兼拥有三成所有权)。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田面业主缴纳过“押租”的情况下,田底权和田面权可以分别相对独立地转让。

从已见到的清代南方许多地区土地交易契约来看,土地交易的效率是很低的。房地产交易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分多次,有时需历时几年才能完成,付款也不是一次付清,而是需要多次讨要,每次都需签约,即所谓“找贴风俗”。一般来说,至少需要签订四次约,即卖契、加契、绝契、叹契,甚至多达六七次的(装修契、兴高起造契等)。房地产买卖中,亲邻有优先权。在买卖过程中,房地产可以被卖主赎回。在所有手续完成之前,产权很不清晰。这种“找贴风俗”不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这种风俗渐渐改变,以至消失。在北方,虽然目前尚未找到类似找贴风俗的案例,但有一种土地“出典”的习惯,出典土地最终可能有不同的归属,在出典期间土地产权是不清晰的。

三、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从20世纪50~8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一个十分热门的研究课题,为的是证明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何为资本主义萌芽?没有人给出非常明确的标准。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由雇工制度;二是商

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7页。

② 程念祺:《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7页。

③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6~99页。

人支配生产或工场手工业制度。有主张明清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有主张宋代就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更有主张秦汉就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成果非常多,但论证不很严密。而且,研究者并没有找到棉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棉纺织业是关系到传统社会基本生产方式的手工业。

历史不能重演,我们不能知道,如果没有西方入侵,中国何时能够自发地演进为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不能知道,学者们所论证的各种萌芽,到时候是否能够真的演进为资本主义的大企业;我们不能知道,单单生产领域的所谓萌芽,能否引发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因为即使在西方冲击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转型尚且十分艰难,而一直没能完成。

而且,我们还需要明白,即使是西方国家,大多数也不是完全自主发展的。日本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德国也是在受到法国等国的冲击甚至战争的情况下,才实行改革和转型的。俄国也是如此。美国曾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在经济制度和工业革命等方面,受到英国决定性的影响。中国曾经领先于世界,也曾经落后过。这仅仅显示了事物发展的不均衡性和波浪性规则而已,中国暂时的落后说明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遭遇到发展的“瓶颈”,这个“瓶颈”可能主要并不在于有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上。

四、如何评价秦统一中国

过去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是千古奇勋。本书编者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应与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实行大一统制度是形式超越了内容的冒进。人民要承受多少福利损害和自由损害,来满足专制大一统的庞大政府、数十万上百万的军队、征发数十万上百万的劳役去修长城、修皇陵,即使从技术层面讲,连多少人口、多少土地都搞不清楚,要实行有效统治是困难的,政府对自身的监管也是困难的。而改朝换代的成本又特别高,连绵不绝的战争造成了中国人民史不绝书的苦难。同时,大一统并没有把中国的版图固定住。

五、人口压力对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的负面影响

清朝中国人口剧增,对农业和手工业的影响是巨大的。人口压力造成了地权的分散,对农业的规模经营是不利的。由于人口多,农业和手工业就缺乏激励,当时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已经低于零,再搞技术进步,潜在的农业失业人口更会增加。手工业领域的技术进步也会造成大量手工业工人的失业。因此,人口压力是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节 鸦片战争失败后签订的中外不平等条约的主要内容^①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及附约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如下:

(1) 中国割让香港。

^① 孙健:《中国经济通史(1840~194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2~700页。